



# 环境议题的传播现状与优化路径 ——基于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比较分析

黄河 刘琳琳

## 摘要

环境议题传播维系着环境领域的信息互通、意义共享、对话协商与共赢协作。本文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切入,采用内容分析法与文本分析法,分别对呈现政府环境议题构建的传统媒体和表征公众或社会组织环境议题构建的新媒体进行抽样分析,在评述了两类媒体中环境文本在议题选择、话语结构、叙事策略和主体角色等方面的差异、问题的同时,进一步论述了环境议题传播的优化路径。

## 关键词

环境传播、环境议题、议题建构、话语分析、优化路径

## 作者简介

黄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媒体研究所副所长。电邮:huanghezcz@vip.sina.com。

刘琳琳,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自主课题资助。

##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Optimizing Route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HUANG He, LIU Linlin

## Abstract

The function of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not only maintains the information interaction in environmental area, but also promotes consul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environmental issu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the paper makes comparisons between traditional media and new media which holds the government position and other represents the public.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 and text analysis, the environment texts of the two kinds of media represent obvious differences in main issues, discourse structure, narrative strategy and subject role.

###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issues, issue construction, discourse analysis, optimizing route

### Author

Huang He is the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huanghezzz@vip.sina.com.

Liu Linlin is the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Social Development which is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key research base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一、引言

“环境传播”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在当代中国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背后是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频繁发生的环境事故与环境灾害。这一状况与上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国相似:在上世纪的前五十年,美国卷入疯狂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同时,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环境问题也持续加重,这直接引发了之后的“寂静的春天事件”“拉夫河事件”“环境正义运动”“绿色政党”等环境运动,并催生了在七十年代后期“旨在改变社会传播结构与话语系统的任何一种有关环境议题表达的传播实践与方式”(Luhmann, 1989: 28)的“环境传播”的诞生。

在我国,对环境问题的关注亦可追溯至上世纪七十年代——1973年国务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此后的近四十年中,“环境保护”上升为“基本国策”,相关部门自1975年开始相继编制了八个国家环境保护五年计划。但现实并不乐观,环境持续恶化的总体态势并未得到有效遏制,环境事故和环境灾害频发,环境保护部2013年6月发布的2012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中将中国环境形势表述为“依然严峻”。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的四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的时期。尤其是近年新媒体对社会生活结构的重塑(陈力丹,2013:82-83)以及在其影响下公民意识的提升,已经使环境议题由专业议题转化为社会议题——在范围上,环境议题不仅包含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等方面,还纳入了公共政策、社会动员、社会协商等多个领域;在实践中,环境问题一旦爆发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不仅难以限制于一地,甚至还会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围观与批判(陈阳,2010;贾广惠,2011)。这要求我们对环境议题的认识不能继续局限在自然科学范畴,而应该纳入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学科,采用系统的、多元的、动态的视角进行考察(洪大用,2002)。

从传播学的视角去看,环境议题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实用主义与建构主义问题。基于实用主义之维,环境议题涉及信息封装、传递、接受与反馈;而就建构主义维度而言,通过特定的叙述、话语和修辞等表达方式,环境传播表征或建构着环境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政治命题、文化命题和哲学命题(Cox,2009:20)。环境议题的传播实际上维系着各方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互通与意义共享,并推动议题的协商与解决。鉴于近年来环境事件及环境问题中凸显出来的环境议题传播之于我国环境风险的化解、环境危机的应对、环境事业的发展、整个社会和谐促进等方面的重要性,对目前环境议题传播的现状和问题加以考察和剖析,并对环境传播的优化路径做出判断显得非常必要。

##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基于笔者对相关文献做出的梳理,环境议题的传播主要可以参考下述三类理论框架加以探究。

第一,风险沟通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风险沟通研究于美国的兴起即为解决当时面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技术隐患等现代性风险的威胁,人们要求知情权与参与公众政策的权利导致的各种抗议和社会运动频发的状况(张洁,张涛甫,2009)。这一背景较之我国当前的现状存在较高的重合度,因此具备借鉴意义。通过有效的风险沟通,希望达成的是政府、企业界、科学界和公众之间关于环境风险问题矛盾的调和以及各方新的对话和伙伴关系的形成。伴随对公众权利与诉求的关注,风险沟



通在范式上从遵循以“单向告知”为特征的决定、宣布、辩护（decide, announce, defend）的DAD模式向重视公众认知、多元沟通、公众参与进行转变。例如Covello等研究者提出在关于健康和环境领域的风险沟通中，专家决策已经遭遇困境，应当加强公众和民间团体的涉入和参与(Covello, V.T.,1987:221-239)；美国环保署在其发布的“风险沟通七大原则”中也开宗明义地指出要“接受和容纳公众作为合法的合作伙伴，风险沟通的目标是培养知情的、参与的、有兴趣的、理性的、有理想的、致力于解决问题的合作群体”（张洁，张涛甫，2009）。

第二，议程设置理论。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效果之一：在议程设置的第一层次，媒介议程可以影响某些对象的显著性，从而影响人们的关注对象及人们对事物的重要程度的判断；在第二层次，媒介议程还可以通过信息本身的结构来影响人们对某一对象的某些属性的判断，从而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大量研究已经证实媒介在环境报道方面的议程设置效果。Khan（Khan，2011）发现媒体与公众在判断什么是当时社会面临的最为重要（和最不重要）的环境议题方面意见高度一致。Johnson（Johnson，2008）也发现媒体对环境议程的设置会影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并会推动他们在现实中采取行动，这一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美国日渐活跃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得到了印证。

第三，话语分析的相关理论。围绕话语理解和话语研究的话语分析理论是探讨大众媒体信息的意义、结构或影响的一个重要视角(梵·迪克，2003:1)。话语分析理论重在研究“人们如何通过‘使用语言’即通过真实的话语活动交换意义”（朱永生，2003），具体包括了对句子间的语义联系、语篇的衔接与连贯、话语的语义结构、话语与语境间的关系等。就大众媒体而言，对其展开话语分析就是将大众媒体上呈现的信息作为一种文本或话语来进行分析(梵·迪克，2003:1)。对此，梵·迪克认为可以从文本及语境两个视角进行：前者是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做出描述，后者则将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在文本视角中，则又可区分为微观结构与宏观结构两个层次：微观层次包括语音、词汇、句型及其意义，宏观层次则对话语的所有部分或者说整个话语进行描述(梵·迪克，2003:28)。

本研究重点关注环境议题传播中各传播主体“说什么”和“怎么

说”。作为我国两大舆论场，由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形成的“新闻舆论场”与网民基于论坛、微博、博客等新媒体平台营造的“民间舆论场”，在环境议题传播方面较为鲜明地凸显出党政的“官方议题”及公众、民间意见领袖、民间社会团体的“民间议题”在议题选择、逻辑设计、叙事方法等方面的异同。对这些异同的分析利于明确各利益相关者在环境传播中存在的阻滞、错位、对抗等问题的真正症结，据此对传播意识、原则和策略等加以有针对性的调整和优化，方能真正实现前文所提到的信息互通与意义共享，对话协商与共赢协作。

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内容分析和文本分析结合的方式，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中的环境议题建构进行对比研究。在对比研究中，基于话语分析的文本视角，借鉴梵·迪克的宏观结构理论，将议题建构的维度主要提炼为以下四个方面：（1）议题类型，即何种议题受到的关注最多；（2）话语结构，主要关注宏观议题下各分议题的叙述逻辑；（3）叙事策略和叙事行为，即叙事目的和相应话语的建构策略以及文本中内容、意义的展现方式；（4）主体角色，即各涉事主体在文本中有意无意呈现出的角色特征。

本研究抽样的样本主要划分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两大类。传统媒体方面，基于样本的易得和完整性两方面的考虑，此次抽样选择《人民日报》、《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绿版）》三份报纸为样本：《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相关环境报道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相关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上的政策与主张；《中国环境报》是国家环境保护部主管的环境保护专业报纸，能够较全面地反映我国环境保护实践与发展的前沿问题；《南方周末（绿版）》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于2009年创办，是由市场化运作的传媒集团设立的国内第一份环境新闻深度报道的独立版面。新媒体方面，则选取天涯论坛和新浪微博作为样本：前者是我国目前用户规模最大的网络论坛，后者则是现阶段极具影响力的社交化媒体平台之一。上述样本中，笔者对《人民日报》2003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十年间涉及环境议题的报道（全样本）共2549篇进行编码，聚焦议题类型、报道框架、文章类型、消息来源、报道倾向、关涉对象及表现、诉求方式等进行内容分析；针对《中国环境报》《南方周末（绿版）》则选择2012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一年间的相关报道展开



文本分析；而天涯论坛与新浪微博则根据关键词搜索的方式收集文本做出文本分析。

### 三、差异、问题与思考

经过对比研究，笔者发现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环境议题建构中主要存在如下需要思考的差异和问题：

#### （一）核心议题的偏离与宣传的无力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对环境问题的划分标准，笔者将环境议题分为常规议题与突发事件议题两类，其中常规议题包括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核与辐射污染防治、重金属污染防治、固体废弃物污染处理处置、化学品环境污染防治、自然生态保护与监管、环境宣传教育、节能减排、全球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以及公众参与等13个方面；而突发事件议题则重点包括环境事故与环境灾害两类。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传统媒体报道所涉及的环境议题中，常规性议题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尤以生态保护与监管、节能减排两类议题最为突出。以《人民日报》为例，常规议题占环境议题报道总量的95%，其中自然生态保护与监管、节能减排两类议题分别占38.8%和26.2%，共计达到常规议题数量的65%；这一特点在《中国环境报》和《南方周末（绿版）》中亦有明显体现。而在新媒体平台，受到关注的环境议题则集中于各类污染议题，而且不论污染事件是否属实、污染情况是否严重、影响范围是否广泛，活跃在新媒体平台的网民对其关注度都非常高。

这一发现值得我们深思：以传统媒体为代表的自上而下的环境传播与以新媒体为代表的自下而上与横向并行的环境传播，在关注议题上无法形成对接和呼应。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相关政府部门通过传统媒体以及传统媒体自身投入人力、物力、媒体资源组织的环境传播，在内容上越来越难以获得公众的持续关注和深度关心；其长期秉持的自我中心式的、自上而下的、强调告知与说服的环境“宣传”不断陷入“飞沫化”的困境（黄河，王芳菲，2013:100-109）。

#### （二）自成体系的话语结构与共通意义空间的缺失

话语结构关注主题之下的意义群落的组成结构。

在上述环境议题之下，笔者将各类议题进一步细化为如下六类议题进



行话语结构的分析：政策法规类（涉及政治思想、政策贯彻等）、环保工作类、人物类（涉及环境工作者、环境志愿者等）、技术创新类（科技创新、产品创新）、社会力量类（涉及环保组织、企业、普通公众等）、价值文化类（涉及生态观、发展观等）。对比发现，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上述议题的话语结构自成体系、各有侧重、差异明显。

**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环境议题的话语结构对比**

	传统媒体	新媒体
政策法规类	描述中央及地方在环境政策法规上不断出新，突出中央及地方党和政府对环保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描述具体环境事件的危害范围及危害程度，对比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认为目前环保政策法规仍有不足。
环保工作类	各地方政府正在“铁腕治理环境污染”、“着力推动生态环境改善”，以完成国家要求、回应公众期盼。	指出地方及基层环保工作在方式、效率、效果上的“问题”，认为从工作开展到队伍建设仍有待加强。
人物类	一方面环保工作者勇于创新、敬业奉献；另一方面环保志愿者身体力行，无怨无悔。前者是报道重点。	民间的环保志愿者是重点。
技术创新类	我国的环保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突出地方鼓励、企业着力通过技术创新贯彻节能减排、推进生态保护。	一些新技术或新方法可以在日常生活、企业生产中发挥节能环保的作用。
社会力量类	公众积极参与环保活动以及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这一成果得益于政府的组织引导。	普通公民、环保组织等民间力量不断采取行动保护环境、捍卫家园，这是公民权利与责任的体现。
价值文化类	通过地方环保成绩的报道来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通过具体实例展现低碳生活、可持续发展理念。

这反映出的一个问题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的传播主体对某些环境问题的认知与判断在某种程度上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所谓共通的意义空间，即传受双方对符号意义拥有的共同理解，它是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对话、沟通得以实现的重要前提(郭庆光，2008:6)。共通的意义空间越大，传受双方在某些基本问题上的认知越趋向于一致，进行对话的基础就越牢固，相互了解的意愿、理解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拥有、扩大共通的意义



义空间在客观上有利于传播过程的顺利进行,有助于增强传受双方的互动与沟通;相反,缺乏共通的意义空间,往往会使对话演变为“话不投机半句多”“道不同不相为谋”,最后仍然是基于自身的立场自说自话,传播很难取得良好的效果。

### (三) 叙事策略冲突与达成共识的艰难

在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上述主题的叙事策略以及叙事行为进行细化分析时笔者发现两者亦存在显著区别。传统媒体在上述六类议题中的叙事策略具备一定规律性。例如,在政策法规类文本中,传统媒体主要通过各地方多样的“决定”“规划”“计划”“体系”内容来体现“贯彻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以“困难多”“任务重”和“保证完成”来表现地方政府“优质发展”的决心;而在环保工作类文本中则强调政府通过“加强环境管理”“严格环境执法”“创新工作机制”,使各项环保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人物类文本侧重表现环保工作的辛苦与困难,突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舍小家顾大家”的奉献事迹;科技创新类文本以描述技术优势 and 实际效益为主,表现新技术基于现实资源和需求,在创造了效益的同时降低污染;社会力量类文本则直叙各地方多样的宣传活动、表彰奖励,营造出政府领导,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环保的浓烈氛围;而文化价值类文本则叙述环境质量趋好、节能减排有成效、污染治理有推进、生态经济有发展、机制建设有创新,并将之归功于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战略的指引。而在具体的叙事行为上,传统媒体亦习惯采用通过突出发展目标、罗列数据和指标、引用权威话语和列举重点项目的方式加以体现。

然而,新媒体则更倾向于强调“矛盾”与“冲突”,以突出当前环境形势堪忧以及相关政府部门、企业在执法、守法中存在的缺陷与问题。这一叙事策略在叙事行为上呈现出了事实与情感相结合,尤以诉诸情感为主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相关网帖在诉求方式与手段上的重感性轻理性、重标题轻内容、重引爆轻引导、重公众轻官方等方面。

笔者认为造成上述明显差异的原因有二:

其一,关注议题类型与话语结构的不同直接导致了两者在叙事策略以及叙事行为上的差异。其中,话语结构是“能够包容整个篇章的命题内容的意义结构”(廖秋忠,1991),也就是说话语结构代表了整个文本所有组成单元的共有命题,而作为下一个层次的叙事策略和叙事行为必然要遵







循话语结构体现的意义与逻辑。

其二，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具有不同的传播特征——传统媒体“点对点”的传播模式强调专业性与权威度，其清晰的管理机制保障了“把关人”的地位，使其内容在更加规范与严谨的同时，也具有更强烈的“官方立场”或“组织立场”；而新媒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模式中传播者变成了独立而分散的网民，相比于“官方立场”与“组织立场”，网民往往采用的是“个人立场”，因此在叙事行为上相较于传统媒体以群体抽象为基础的“宏大叙事”，更倾向于采用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私人叙事”（雷颐，1997）环境议题的传播的重要目标在于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公众间就该议题共识的达成；达成共识需要良性、有效的对话与沟通作为基础。而显然，上述叙事策略与叙事行为的冲突所代表的两者在价值观念、话语体系、诉求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难以为对话、沟通的开展营造良性的氛围，达成共识的目标亦变得遥远而艰难。

#### （四）主体角色错位与对话前提不足

政府、企业、环保组织、公众是环境议题中涉及最多的几类主体。在研究中笔者发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分别对上述主体在环境事业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功能存在较为连贯与统一的认知。

**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环境议题的主体角色对比**

行为主体	传统媒体	新媒体
政府	政府是我国环保事业“尽职的谋篇布局者”“实际推动者”“问题解决者”以及社会环保的“有力支持者”。	部分政府以“经济发展至上”为发展思路，对环境问题监管不力、公开不足。
企业	企业是违法排污、高能耗的主体，同时也是技术创新、节能减排的主要力量。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源头。
环保组织	环保组织的主要功能是宣传教育。	环保组织是环保行动的组织者、倡导者，但在社会动员上发挥的作用有限。
普通公众	普通公众是环保宣传的接受者和参与者。	普通公众是权利主体，享有知情权和监督权。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对上述各类主体在环境保护事业中角色和功能的认知是有较大差异的。从角色理论的角度看,此种差异实质上体现了不同叙事主体对各类社会角色的要求和期望存在错位,这尤为明显地体现为如下两方面。

其一,以政府、企业为典型代表,不同主体对其在环境问题中的角色的期望是统一的,但有的主体认为它们执行或基本执行了其角色所期望的行为,而另一些主体则认为还存在角色差距。以《人民日报》为例,在关涉政府的常规报道中,描述政府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监督与管理、加快环境治理以及加大环境信息公开的文本比例为77%,而指出政府还存在监管漏洞、信息公开不足、救济渠道不畅等问题的文本则仅有6%,这一比例在突发环境事件的文本中也保持了83%与13%的较大差距。而在新媒体上,网民却对政府的表现更多地给予质疑和批评,他们认为政府在履行自身的职责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其二,以环保组织和普通公众为代表,不同主体对他们的角色期望从初始就表现出了明显不同,从而一定程度上加深了此方对彼方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仍以《人民日报》为例,在涉及环保组织的报道中,强调其具备倡导环保理念、组织环保活动以及宣传环保知识等功能的文本比例为62%,而提及监督功能的文本仅为6%,但在新媒体上,相较于宣传教育,网民则更加关注环保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同样,在涉及公众的报道中,《人民日报》中47%的文本提及公众在环保宣传的带动下环保意识以及参与环保活动的热情逐步提升,而新媒体则更加强调公众作为权利主体的角色——要求其在环境领域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但这些内容在《人民日报》中的提及率不足五分之一。这深深地制约着环境领域中“对话”这一重要传播活动的展开,因为对话的前提是平等、尊重、互信,而环境传播主体对彼此核心角色理解的错位却一定程度传达了其对对方价值的漠视、忽视甚至不屑,对话前提因此变得脆弱不堪。

#### 四、问题的根源与优化路径

无论是议题的偏离还是封闭的话语结构,是叙事策略的冲突还是主体角色认知的错位,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环境传播真实的现状。表面上看,这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文本呈现上的差异;但更进一步去分析,





就会发现这是环境传播的两大主体——政府与公众在环境领域的需求、关切、目标、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

笔者认为，这些表面的差异和实质的不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作用。

一方面，政府长期“替民做主”、重管理轻服务的执政思路，使得其自身及作为其喉舌的传统媒体一直沿用单向灌输、宏大叙事、正面为主的宣传路径，“对上负责”重于“对公众负责”，自说自话远多于基于倾听的互动交流，“见数不见事、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格”的官样文章是报道的主要方式。

另一方面，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加快了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社会治理结构的解体，在充分获取信息的同时，公众的以责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为核心的公民意识不断加强，公众对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和环境事件愈加关注，并在参与环境决策、环境保护与环境监督方面表现出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新媒体平台上公众就环境议题持续发声即是典型表现）。然而，反观政府及大多数的传统媒体，其对“技术民主”引发的社会广泛的对话与协商的需求显得准备不充分，缺乏足够的信心和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基于此，当前优化环境议题传播的关键在于转变政府和传统媒体在环境传播中的认识、观念与方法。

第一，政府和传统媒体要扭转环境传播是围绕环境事业展开的正面宣传和应对环境事件时的被动解释的认识，将其置于战略高度加以规划，确立集信息公开、议题传播、环境教育、公众对话与危机响应为一体的环境传播工作体系；

第二，政府和传统媒体有必要更多地着眼于公众的整体生活处境以及环境权益诉求，开展“公众本位”的环境议题传播，使其有机融入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打造、回应或引领普罗大众的生活路线，使社会各方在持续对话中达成可合作的交流框架；

第三，政府和传统媒体需坚持话语创新，主动、有节奏地输出客观的、平衡的、符合新闻基本规律的报道，从而建构与公众共通的意义空间和话语体系。比如在环保工作类议题传播上，不再一味渲染政府的核心角色，而是学着将环保成就归功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不再只是高歌成





绩,而是敢于坦诚地承认现存的问题并希望与社会各界一起共同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又如在技术创新类议题传播上,避免简单地从技术范畴描述各类环境科技,而有必要将环境科技的创新与大众可以感触的生活和价值有效结合起来,以关心、责任、权益、信任、长远等为传播加上感性的色调。再如,在人物类议题传播上,抛弃长期采用的千篇一律的榜样式典型人物宣传的方式,学会用讲故事的方法将环保人物置于大的时代背景之下,通过描绘环保人物(注重环保工作者与民间环保志愿者的平衡)的个性、情感、得失、荣辱等,突出其人格及命运感,以增强受众的普遍关注与深度关心。此外,在价值文化类议题传播上,少谈空洞的口号和抽象的道理,多通过新媒体平台洞察社会公众之于环保的心理状况、实际需求和践行理念,并以讲述真实故事的方式将其与时代精神、价值观念与人文关怀等有机匹配。

(责任编辑:任天浩)

###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陈力丹 (2013). 把握新媒体对社会交往结构的影响.《新闻爱好者》, (2), 82-83.  
[Chen, Lidan (2013). To Grasp the New Media' s Impacts on Social Communication Structure. *Journalism Lover*, (2), 82-83.]
- 陈阳 (2010). 大众媒体、集体行动和当代中国的环境议题——以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为例.《国际新闻界》, (7), 43-49.  
[Yang, Chen (2010). Mass Media, Collective Action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onflict on the Building of A Waste Incineration Plant in Fanyu.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7), 43-49.]
- 郭庆光 (2008).《传播学概论》.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uo, Qingguang (2008). *Introduction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洪大用 (2002). 试论环境问题及其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5), 58-62.  
[Hong, Dayong (2002).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Relevant Sociological Interpretation Patterns.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5), 58-62.]
- 黄河,王芳菲 (2013). 新媒体如何影响社会管理——兼论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与功能.《国际新闻界》, (1), 100-109.  
[Huang, He & Wang, Fangfei (2013). New Media in Social Management: Functions and Impac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 100-109.]



贾广惠 (2011). 论传媒环境议题建构下的中国公共参与运动. 《现代传播》, (8), 14-18.

[Jia, Guanghui (2011). Public Participation Movement under the media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Modern Communication*, (8), 14-18.]

雷颐 (1997). “私人叙事”与“宏大叙事”. 《读书》, (6), 98-100. 1997. (6), 98-100.]

廖秋忠 (1991). 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4), 16-44.

[Liao, Qiuzhong (1991). Text, Pragmatic and Syntax Studie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4), 16-44.]

张洁, 张涛甫 (2009). 美国风向沟通研究: 学术沿革、核心命题及其关键因素. 《国际新闻界》, (9), 95-101.

[Zhang, Jie & Zhang, Taofu (2009). Risk Communication Researches in the USA: Academic Evolution, Core Proposition and Key El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9), 95-101.]

朱永生 (2003). 话语分析五十年: 回顾与展望. 《外国语》, (3), 43-50.

[Zhu, Yongsheng (2003). Fifty Years of Discourse Analysis. *Journal of Foreign Languages*, (3), 43-50.]

梵·迪克 (2003). 《作为话语的新闻》, 北京: 华夏出版社.

[Dijk, V. (2003). *News as Discourse*. Beijing: Huangxia Publishing House.]

Covello, V. T., Winterfeldt, D. Von & Slovic, P. (1987). Communicating scientific information about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risks: problems and opportunities from a social and behavioral perspective. In V. T. Covello, Lester B. Lave, Alan Moghissi & V. R. R. Uppuluri, *Uncertainty in Risk Assess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Advances in Risk Analysis)*.

Cox, J. R. (2009).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London: Sage.

Johnson, E. W. (2008). Social movement size, organizational d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federal law. *Social Forces*, 86 (3), 967-993.

Khan, M. A. (2011).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nda sett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22 (2), 52-70.

Luhmann, N. (1998). *Ecological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